

鼠疫：战争与和平

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曹树基 李玉尚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鼠疫：战争与和平

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曹树基 李玉尚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曹树基，李玉尚著．—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9

ISBN 7-80713-374-0

I.鼠... II.①曹... ②李... III.鼠疫—流行病—历史—研究—中国—1230～1960 IV.R1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978 号

责任编辑 齐敬霞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29.75 印张 47 幅图 4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环境史



曹树基，1956年生，江西省南昌市人。先后于1977年、1982年和1986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

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学习，分别获历史学学士、农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1984～1986年）、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1989～1996年）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1996～2004年），曾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历史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客座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长期从事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疾病史研究，在中国人口史领域发表多种著作及论文，在中国疾病史领域发表论文十余篇。



李玉尚，1975年10月生于山东省即墨市。200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其博士论文获“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 齐敬霞

装帧设计 宋晓明

目 录

第一编 研究的缘起、背景与概念 / 1

第一章 楔子 / 3

新大陆的故事 / 3

医疗、疾病与鼠疫 / 7

本书的思路 / 13

关于资料和方法论问题 / 17

第二章 疫鼠之家 / 21

鼠疫的起源 / 21

疫鼠之家 / 26

退缩与扩张 / 34

小结 / 48

第三章 从文献中识别鼠疫 / 50

民众视野中的鼠类活动 / 50

民众对患者症状的描述 / 54

鼠疫的异名 / 57

“鼠疫”的出现 / 67

小结 / 74

第二编 战争与灾荒：危机中的疫情 / 77

第四章 转折的时代 / 79

战马传播鼠疫 / 79

元代的传说与事实 / 89

从东方到西方 / 95

人口的死亡 / 99

小结 / 100

第五章 老鼠“消灭”了明朝 / 102

“生核”与“肿项” / 102

万历疫情 / 103

崇祯疫情 / 114

北京的陷落 / 120

南方的疫情 / 123

环境与鼠疫 / 125

战争与鼠疫 / 129

小结 / 131

第六章 刀兵瘟疫 / 133

一个假设 / 133

刀兵瘟疫 / 135

“害痒子死就两倍”：云南—楚雄 / 140

“鼠疫死了十分之七”：大理—景东 / 148

小结 / 155

第三编 和平年代：静悄悄地流行 / 157

第七章 云南模式：地形与交通 / 159

从村庄到村庄 / 159

从市镇到村庄 / 166

从市镇到市镇 / 173

从县到县 / 176

商路的意义 / 183

疫死人口 / 185

小结 / 190

第八章 粤闽模式：城市与乡村 / 192

鼠疫与霍乱 / 192

本土的还是外来的 / 197

以城市为中心 / 206

广东城市疫死人口 / 210

福建城市疫死人口 / 215

乡村疫死人口 / 218

小结 / 223

第九章 东北模式：铁路与城市 / 224

草原上的捕獭者 / 224

铁路和城市 / 229

城市的防疫 / 237

钱家店的故事 / 246

小结 / 253

第十章 西北模式：旱灾与生活方式 / 255

祸起萧墙 / 256

本地的与外来的 / 261

挖鼠洞去 / 266

从村庄到村庄 / 269

从集市到村庄 / 275

小结 / 280

第十一章 西北模式：环境与生活方式 / 283

康家湾的悲剧 / 284

旱獭的诱惑 / 289

流行链：家庭与部落 / 292

寺院的故事 / 297

野牛沟纪事 / 299

小结 / 303

第四编 国家医学：环境与政治 / 305

第十二章 南方的应对：医生、民众与政府 / 307

医界的应对 / 308

民众的应对 / 314

官方的应对 / 321

小结 / 327

第十三章 上海的反应：从旁观者到当事人 / 329

旁观者：纪实与猎奇 / 331

当事人：预防与预后 / 336

公共卫生：观念与行动 / 342

小结 / 349

第十四章 山西疫情：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 / 352

1918 年的全民防疫 / 354

鼠疫还是禽流感 / 362

西医和中医的实践 / 365

传染病：从国家到地方 / 373

小结 / 379

第十五章 灭鼠拔源：20 世纪 50 年代的内蒙古草原 / 381

人民战争 / 382

黄鼠的生境与生态 / 383

从防御到进攻 / 390

剿杀黄鼠的大跃进 / 396

战略、战术与武器 / 405

小结 / 411

第五编 结论 / 415

第十六章 比较的视角：空间的意义 / 417

县与县：以云南为例 / 417

从南至北，由东徂西 / 424

中国与欧洲 / 431

环境哲学的实践 / 439

简短的结论 / 442

图表索引 / 445

参考文献 / 447

后记 / 465

第一编

研究的缘起、
背景与概念

第一章 楔 子

新大陆的故事

1989年夏天，本书第一作者从复旦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来到地处上海西南郊区的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时年33岁。那一年，本书第二作者14岁，正坐在青岛市郊一所初级中学的教室里。两人当时并不相识，也都不曾想到，十年以后，他们会联手进行中国鼠疫流行史的研究，并合作撰写本书。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要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出来。如果说此前的几十年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的话，20世纪80年代则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各种主义竞相登台，各种研究方法都有人去尝试。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中，一切过去被认为是合理的，都被人重新审视；一切概念或理论，都被人重新加以定义或讨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学者面临各种形形色色的历史解释系统，大有眼花缭乱之感。最激进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尝试着建立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解释。新论甫刊，人相争读，一时洛阳纸贵。不过，在那个时代，环境史学还不为人们所重视，西方学术界有关微生物影响人类历史的“奇谈怪论”，尚不为中国学界所知。

就在那一年10月的一个黄昏，一位曾在加拿大某大学历史系短期留学过的朋友与本书第一作者邂逅，站在路边闲谈。这里是上海近郊一个名叫梅陇的小镇，夕阳西下，田野、农舍和蛙鸣构成秋天的景观。不知怎地，他

聊起了“历史时期的传染病”这个话题。从这次谈话中，本书第一作者第一次得知，在欧洲殖民者的美洲大发现中，旧大陆的传染病侵入新大陆，并导致了新大陆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在这之前，他只知殖民者的屠杀征服了新大陆，而不明白，除了枪炮和弹药外，殖民者还带去了微生物和致病菌。这个故事给本书第一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久久不能释怀。用疾病解释历史，对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青年学者而言，不啻是一块有待开拓的新大陆。

在更早的时期，即使在美国，也存在对于这段历史同样的无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这样回忆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100万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对于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所征服的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认为几乎是空无所有的大陆。然而，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海岸地区的描写的仔细研究现已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减少了95%。^①

贾雷德·戴蒙德指出，除了学术上的原因外，由于政治的或种族的需要，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的真相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起来。在疾病生态史家看来，造成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亡的主要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鼠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除了戴蒙德的著作外，类似的描写还见于多种西方历史学著作，其中最权威的著作可能要数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

^① 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①。这本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著作之所以著名,并不在于他描述了历史时期传染病流行的史实,而是藉此题材,麦克尼尔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解释的新系统观。因此,这本著作对于我们,才具有比事实本身更强大的震撼力。

麦克尼尔认为,在微生物世界,各种微寄生物,包括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等微生物在人体组织中的寄生方式,可以称为微寄生。在人类社会,征服者从生产者手中的掠夺则是另一种形态的寄生,可以称为巨寄生。^②两种寄生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而复杂的一面。麦克尼尔认为,以往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种由微寄生物引起的传染病,由此造成对于历史解释的片面性。

麦克尼尔的此项研究,是从旧大陆的传染病在新大陆的传播开始的。针对新大陆被征服的史实,他在书中提出这样的疑问:

众所周知,当时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带了600名不到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的人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这么一小撮人怎么可能战胜人口众多的帝国呢?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③

传统的观点是从军事力量、文化、科技等方面对殖民者的胜利进行诠释,但这并不能消除麦克尼尔心头的疑云。麦克尼尔注意到一个不为人所重视的细节。对于这个细节的深究导致一个全新的历史解释系统的展开。

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将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这是后来西班牙人对这场疫

①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当然,也可能包括其他学者的论著。

②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第7~8页。

③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第2页。

病的称呼。这场致命传染病酿成的瘫痪效应正足以解释，为何阿兹特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及重整，进而联合其他印第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殖民者进入之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从来不生任何疾病。虽然在墨西哥和印加帝国的核心区，居民人口已经密集到这样一种程度，传染病可以在人群之间传播，且不至于因人口稀少而中断。但是，美洲大陆的传染病链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麦克尼尔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所接触到的家禽、家畜本身，并不携带那种可以传染给人类族群的牲畜传染病。居住在安第斯山高处的野生骆马及羊驼，族群又小又分散，不论数量或密度，都不可能支撑这类传染病。欧亚大陆的情况则相反，大批野生牛马散布在广阔的草原和森林中，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彼此在野生状态下的接触距离很近，不需任何中间宿主，传染病可以直接由动物传给动物。^①在长期与各种病原菌接触的过程中，欧亚大陆的居民体中形成了对许多种传染病的抗体，许多病原携带者自己并不生病，却会将病菌传播给别人。换一个角度看，一些微寄生虫有能力与它们的人类宿主达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类感染无疑会导致宿主身体的不健康，但不妨碍宿主的正常功能。这样，这些人类宿主的长途跋涉或者迁移，实际上就成为携带病原的旅行。病菌一旦传入美洲大陆，毫无准备的印第安人便成为受害者。

麦克尼尔的解释还有许多，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是在当年，中国学者无缘读到这些精彩的分析。对于本书第一作者而言，他想了解的仅仅是，传染病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产生过影响？如果产生过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从几本流行病学的教科书中，他开始学习流行病学的有关知识，并尝试着从事这一领域的探索。以后，又有了他与本书第二作者之间的这一合作。

① 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第234～235页。

医疗、疾病与鼠疫

如是一定要将贾雷德·戴蒙德、麦克尼尔等人的研究进行学科划分的话,大概应划入“医疗社会史”或“疾病社会史”之列。在1990年以前,中国大陆并没有此类学科。与此相关的“医学史”的研究者,并非历史学家,而是医学工作者。在学术界,由专业工作者进行的纯粹的科学技术史研究,通常被人称为“内史”;而由历史学者进行的与专业技术有关的社会史研究,则被人称为“外史”。从理论上讲,“内史”关注的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本身,其立足点是科学技术的各个专业;“外史”则更多地将专业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其立足点是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显然,由医学工作者进行的“医学史”属于人们习称的“内史”,而贾雷德·戴蒙德和麦克尼尔的研究,则属于“外史”。

“医疗社会史”和“疾病社会史”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排除“社会史”的内容不论,前者着重“治疗”,药物、疗法是论述的中心;后者着重“疾病”,因为对于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而言,传统的医学体系和医疗手段,疗效较差,因此,“疾病—传播—死亡”就构成了“疾病”的本体。西方医学传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预防成为对付烈性传染病最佳之策,而所谓“医疗”,则随着医学理论的进步和医疗手段的完善,越来越有效地介入患者疾病的处理。这一过程,通常不再进入历史学家的讨论范围,或者,不成为历史学家的讨论重点。所以,以疾病为中心的社会史,更多地讨论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或烈性传染病对于人口和社会的影响。本书的讨论即在这一框架中展开。

之所以选择鼠疫流行史作为对象,主要是因为我们受到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流行病学或传染病学教科书中,谈及鼠疫时,都会有关于14世纪欧洲疫情的描述;而在论述中国鼠疫流行史时,也多提及伍连德的研究成果。这些简短的介绍性文字,对当时一无所知的本书第一作者,产生强大的震动。这是因为,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完全为以前的中国史学所忽略。于是,他想知道,中国的鼠疫流行究竟与西方有何不同?经历了一次次鼠疫大流行的中国,人口怎样变动?社会如何应